

可以概括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要培养国家的主人翁,就要贯彻自主自治的教育;改造传统的儿童教育,对儿童养成发表力的教育,比养成容受量的教育更重要;改革中等教育,对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和学制都应进行根本性改革,培养出“健全的公民”;改革高等师范教育,高等师范的课程要以教育为主体,不应以分科的学科为主体,要培养学生研究实验的精神;反对文化侵略,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他指出教会学校是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他认为反对文化侵略,不是反对欧美文化,打破崇拜欧美的迷信,不是盲目赞美传统文化。恽代英的教育思想是高层建筑,他从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需要论教育,把社会实际和教育实际统一起来,作为改革教育的出发点。他的改造教育的主张、态度、对今天的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贤江(1895—1931) 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家。字英文(英甫),笔名李浩吾、李谊、叶公朴等。浙江余姚县(今属慈溪县)人。1911年毕业于诚意高等小学堂,并留校任教。1912年秋,考进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此时信奉“教育万能论”。1917年毕业于,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1919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南京分会书记和《少年世界》编辑。1920年同李大钊等7人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评议部议员。1921年初,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编辑,此间对杂志进行革新,被誉为“学生界定期刊物中思想最高尚、最纯洁、最缜密、最普遍而又是最富于革新精神的杂志。”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协助恽代英编辑《中国青年》,并到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学习。1924年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学生工作并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长。还兼任浙江山虞县春晖中学教务主任,在上海大学及附中讲演,发起对教育界复古思想的批判。1925年投入“五卅”运动。1926年至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并亲赴斗争现场。后赴杭州,任第一师范校长。兼作《民国日报》编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革命军日报》社长。1927年底,赴日担任中国留学生共产党组织负责人。1929年回上海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文委的领导工作,因积劳成疾,1931年8月9日在日本长崎病逝,年仅36岁。杨贤江留下大量著作和译著,其中教育专著有《教育史ABC》,这是中国最早一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历史的著作;还有《新教育大纲》,这是中国第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

地阐明教育理论的著作,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两部著作奠定了他作为新兴教育理论先驱者的历史地位。杨贤江认为教育是上层建筑,它同经济基础有依存关系,教育既受生产方式也受政治制度所制约,又对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起促进作用;教育由于生产劳动的需要而产生,并在劳动过程中发展起来;教育的“本质”,是与生产劳动密切配合,为全社会所共享;但是到了阶级社会,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并同生产劳动相脱离。他还认为,革命胜利后,教育应促进新社会的建设。在中国教育史上,他第一次明确主张对青年进行“全人生的指导”。杨贤江对中国教育理论具有开拓性的和卓越的建树。

杨秀峰(1897—1983)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又名秀林。生于河北省迁安县杨团堡村。1915年毕业于河北省立滦县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在江西省鄱阳中学、河北省立通县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9年赴法留学。次年在法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与领导中国留法学生和华侨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游行,被驱逐。嗣后辗转比利时、德国、英国参加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工作,并赴苏联学习。1934年回国,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天津河北法商学院任讲师、教授,并自编教材,开设马列主义课程。还在北师大校刊上发表学术论著《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他积极组织抗日救国团体,被誉为“红色教授”,被国民党特务追捕。1937年,他投笔从戎,带领学生深入农村,组建冀西抗日游击队,开创革命根据地,在华北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抗战、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他先后担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抗战时期,他创建河北抗战学院。兼任冀南行政干部学院院长,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学院院长、晋冀鲁豫边区抗战学院院长,为抗日战争造就了一批中坚骨干。抗战后,他亲自筹建北方大学,为解放战争培养了一批干部。在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期间,采取了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河北省的教育事业。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1958年高教部与教育部合并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务院文教办副主任。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他长达14年担任高教部、教育部长期间,参与了中央教育工作的重大决策,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发展、

改革、提高人民教育事业,为逐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做出重大贡献。1961年后,他曾组织起草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重大的教育改革法规。并在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他恪守教育的科学规律,坚持学校以教育、教学为中心,尊重教师、重视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使中国的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杨秀峰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武训(1838—1896) 中国近代民间教育家。初以排行第七而名武七。山东省堂邑(今属聊城)人。“训”,是清朝嘉奖其兴办义学的赐名。武训幼时丧父,家境贫寒,随母讨饭。少年时当长工。他很羡慕读书人,自恨不识字,于是萌发了“修个义学为贫寒”的想法。于是将讨乞所得,积累放债,购置田地230余亩,以此设义学于柳林村,学塾分蒙学和经学两级。后来又在馆陶、临清两县设义塾,并资助书塾。他经常来往塾中,对于辛勤执教的老师叩头感谢;对于不尽职节的教师和顽皮不服教育的学生,他则跪泣劝之。因此,师生都互相戒勉。因武训行乞兴学,山东巡抚张曜、袁树勋疏请清政府嘉奖武七,清政府赐其名,授以“义学正”,赏穿黄马褂,但他没有接受。1896年逝于临清义学庠下。武训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平民教育和普及教育提供了新鲜思路,其热心教育、献身教育的精神对后来者有很大影响。

马相伯(1840—1938) 中国近代教育家。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晚号华封老人,天主教的教名“若瑟”。江苏丹阳人。幼年入塾,先读天主教经典,后读儒书。11岁时,只身逃到上海入法国天主教办的依纳爵公学(后改徐汇公学)读书。学名马斯威。1862年接受神学训练。1870年获神学博士学位,授职为神甫,成为耶稣会教士。1872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教学之余研究哲学和数理科学,译书百余卷。1877年接任山东淮县机械局差事,次年奉李鸿章命调查山东矿务。1881年赴日任使馆参赞、驻神户领事,同年秋回国随李鸿章到天津办事。1882年赴朝鲜襄助办理新政。1884年回国仍投李鸿章门下帮办洋务。1899年回上海,与其弟马建忠共著《马氏文通》,后以弟名出版。在沪期间转向文教界活动。因教授丁文而结识蔡元培。蔡元培于是选派一批青年跟他学习,一时名声大振,从其授业者日渐增多。1903年,创办震旦学院,自任监院,其下设1总干

事,1会计,其余行政诸事皆由学生自己管理。他的办学方针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这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大改革。1905年外籍教士乘马相伯养病之际,改变办学方针,学生大哗,相继离校。他于病中召集离校学生,与熊师复、表现澜等商议另立新校,遂于当年秋在吴淞提督行营创建“复旦”,马为校长。李登辉主持教务工作。经过马相伯的惨淡经营,逐步打下了复旦大学的基础。中华民国成立后,马相伯曾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旋即辞职,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拟立“函夏考文苑”(类似研究院)、“校勘古籍、编纂辞典,奖励著作,表彰硕德”,但未成功。后来又与敛之发起“辅仁学社”,设在北京西山,招集生徒,讲授经史的百家之学,这便是辅仁大学的前身。这时,袁世凯复辟帝制,马相伯坚决反对,并驳斥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1918年,任中国科学社董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救国活动,呼吁“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主张抗日,被尊为爱国老人。1938年于右任请他移居昆明,在凉山途中病逝。马相伯是中国近现代新教育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之一,对中国教育的革新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吴汝纶(1840—1903) 中国清代学者、教育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授内阁中书。很得曾国藩赏识,留佐幕府,后参李鸿章幕,当时曾李的奏议多由吴汝纶起草议定。曾任直隶深州、冀州知州、天津府知府。在任内,他一方面出色的处理日常事务,一方面“日以课士劝学为事”,“其治以教学为先”。曾经应李鸿章聘,主讲保定莲池书院。1901年由张百熙奏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但他固辞不获,请求先去日本考察。翌年赴日考察学务3月,写成《东游丛录》,主张新教育,将新山教育观念带进中国的教育界。回国后归里省墓,创办桐城小学堂。提出“采西学”的教育主张。“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须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进”;认为改革中国教育须分两步,一为救急之法,开办各种速成学校,借以培养急需人才;二为长远之策,从普及教育做起,循序而进。还提出采用省笔字(简汉字),推广统一国语,各级学堂要大减功课、缩短年限等。主要著作辑录为《桐城吴先生书》。他为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作出了贡献。

张百熙(1847—1907) 中国清代教育家,字治秋,湖南长沙人。曾任山东学政、广东学政。1902年任管学大臣。同年主持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并奉旨恢复京师大学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学设

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学校经费、校舍建筑、图书仪器设备都作了详细规定。认为办学要重视教材的编写；要重视教师的延聘，尤其是总教习人选的物色；要注意把筹集教育经费放在重要的地位。主张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外，他对实业教育、幼儿教育、师范教育都有很精辟的见解和教育实践。1903年他和张之洞、荣庆重新拟定《奏定学堂章程》。他的教育论著见于其任管学大臣期内上呈的奏折。如《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等。张百熙对中国近代的教育改革事业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他拟定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最新式最完整的学校系统，它改革了中国封建式的学校形式，为中国现代形式的学校制度奠定了基础。

孙诒让(1848—1908) 中国清代经学家、文字学家和教育家。字仲容，号籀廌，浙江瑞安县人，曾任清政府学部咨议官、浙江学务议绅、浙江教育会会长等职。同治六年乡试中举，此后8次未中礼部会试。中日甲午战争后，受梁启超、黄绍箕等人影响，深悔生平所习“与现时不相应”，遂转而积极参加变法维新活动把阐扬周、孔六艺之教的主张和兴学以致富强的观点结合起来，以废科举，兴学校为解决民族危机的主要手段。竭力主张“广兴教育以植自强之基”、“富强之原在于兴学”的教育救国论。率先在家乡创办新式学校，走上兴学育才的道路。1896年在瑞安首先设立“专修算学”的瑞安学计馆，为中国最早的算学专门学校之一。次年创办专修英语、日语的瑞安方言馆和蚕学馆，1899年又办瑞平化学堂，均为浙江开风气之先。1902年筹设温州中学堂，又开浙南地区中学教育之先声。1903年，发起并成立了师范教育研究会，十分重视师资培训，组织师资读书社，帮助教师学习教育理论，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并开设暑期音乐、博物、理化讲习班多期，为温州、处州两府培养一批合格的教师。他主张男女教育平等，认为“普及教育应兼重女学”，亲自创办宣文、毅武、德象3所女学堂，带头送族内女子入学。1905年浙江省学务处在温州、处州两府特设学务分处，他被推为总理，主持温、处州两府16县的教育工作。至1908年初，共举办各级各类学校300余所，对浙江教育近代化产生重大影响。在多年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撰写了《学务平议》一书，提出了把教育作为国家大事来看；要保国粹，传授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筹官吏之普及教育；筹学校之大宗经费；注重初级小学的应用科目；专设补习学校添招听讲生；译教科书宣统一书名；优异下户学生之父兄；重官绅商子弟不入学之

罚；优奖久任学校的教员；罢教职而提学田以助学费；设女学位以奖女学；教草书以代简字；除迷信以兴科学等关于教育政策、方针、教育内容、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注证，对当时的教育改革起了很大作用和影响。此外，他还著有《墨子闲法》、《周礼正义》等学术著作。1905年他撰成《东瀛观学记叙》，提出当务之急宜将外国的先进教学方法、管理手段、教科书，“博观精考”。发展教育应从中国实际出发，先发展国民初等教育继而办好师范，以培养合格教师为要等观点。在当时亦产生很大反响。

廖世承(1892—1970) 中国近代教育家。字茂如，上海嘉定人。1908年入上海南洋公学读书，1912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1915年入美国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获学士、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积极投身当时的学制和课程改革运动，力主“六三三制”。1920年，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实验室，与陈鹤琴一道在中国首开心理测验的实验和研究，编制了一些中小学用的各种测验材料，合著了《测验概要》等书，被公认为“廖氏之团体测验”。推动了中国心理测验、教育测验事业的发展。1924年在道尔顿制风行之际，组织教师十余人开展道尔顿制与学科制之比较实验，写出《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认为道尔顿制不适合于中国，影响很大。1927年—1937年间主持光华大学附中，使之设备完善，办理认真，成绩斐然。同时面向整个中等教育，进行宏观系统研究。此间发表了《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中等教育》等几十篇论文。1938年—1947年间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培养出不少高等院校领导骨干和专家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光华大学副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一生著作很多，其主要著述有《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教育测验和统计》等。另与陈鹤琴合著《智力测验法》、《测验概要》等。廖世承在中学教育、幼儿教育和心理测验、教育测验等学科领域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于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文 献

《学堂教科论》 中国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著。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由杜亚泉主持的上海普通学书室出版。书中批判了旧教育的六大害(鄙、乱、浮、慧、伎、欺),主张废科举、立学校,提出了新的普通教育的4个学级及其应设置的课程架构和内容,并对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普通教育各学科的教学顺序和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特为女生设计了“女子普通学级表”,认为在初小和高小阶段,男女可同校,课程也相同。该书是蔡元培在清末办学实践过程中,搜集国内外资料加以研究而写成的系统勾勒新式普通中小学课程框架的专著。为民国初年筹划全国新教育计划奠定了初步基础。

《东游丛录》 中国清代学者、教育家吴汝纶(1840—1903)所著。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日本三省堂书店初版。全书凡4编:文部所讲,摘抄日记,学校图表,函札笔谈。详细记载编著有1902年赴日3月考察学务的所见所闻,全面介绍了日本的教育状况,提出中国教育要“采西学”,提出办速成学校和普及教育的主张。该书在国内多次翻印,在中国的教育界影响很大,在启发新观念,改革旧教育方面起了一定作用,被誉为清末“新教育”的指针。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中国近代教育家郭秉文(1880—1969)著。191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中文本由周燮译,商务印书馆1916年出版。书中从上起唐虞之际,下迄民国建立,除国家维持与管理的学校外,兼及私学和考试制度。分为8编:上古教育制度之起源,上古教育制度及其退化,汉以后各朝教育之沿革,新旧教育过渡之时代,新教育制度之设立,民国时代设立之新教育,现今国民教育之重要问题,撮要与结论。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与中国的特性互为因果,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教育平等精神。提出唐虞之时为中国教育制度正式形成的时代。并首次提出将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此为国内最早较完整地论述中国教育制度的沿革史的专著,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一定位置。

《智力测验法》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陈鹤琴、廖世承合著。商务印书馆出版。1921年列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丛书。共14章。探讨智力测验的定义、用处、标准、发展历史和施行办法。认为它是用科学的方法,求客观的标准,来测验人的智慧和能力,具有普遍一律、精密准确、目的性强等特点,能消除主观影响,解决教育上如升留级、考试等部分问题。分

门别类介绍了35种国内外的测验方法,有12种是作者创造的,并指出有些测验标准试验过少或不适合中国社会,需加以改进。对核算方法、校阅标准、测验报告制度等问题也有论述。该书所介绍的方法曾在南京等地进行过实验,杨贤江等人参与了实验和研究工作。此书为陈、廖在中国首开心理测验的实验和研究的成果。对中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验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学教育》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廖世承著。1924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集作者在南京高等师范任附中主任及主讲《中学教育》课程之心得,详细记载了1922年学制改革前后关于中学教育的各种学说、主张及设施办法。全书分两编。第一编中学教育原理:包括中国中学教育沿革、各国中学教育比较、中学与小学的关系、中学与大学的关系、中学改组问题初级中学的定义与职能、中学学生各章。第二编中学行政及组织:包括中学行政、中学校长、中学课程、中学学级编制、考查成绩法、记分法和学业成绩报告、中学教师、中学生课外活动、中学自治、中等学校职业指导、中学自行度量标准、结论各章。贯穿原理与具体设施方法并重之原则,讨论各项问题,均一面陈述各种理论,使读者了解问题性质,一面列举具体办法,以供参考。每章末附讨论研究题和中西文参考书报索引。当年被列为高等师范学校教材,后为各地师范院校采用。这是中国现代对整个中等教育进行宏观系统研究的专著。对现代及后来的中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中等教育理论的建设均有重大影响。

《测验概要》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廖世承、陈鹤琴合著。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12月初版。此书是作者根据1923年后国内开展心理测验的新材料、新经验编著而成。成为《智力测验法》后又一部心理测验方面影响很大的专著。全书包括绪论、智力测验、教育测验、测验实施方法、普通统计及列表法、编造测验方法等,共5编,21章。详细阐述了测验的性质、效用、种类、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的材料、实施手续、统计方法、图表样式、编造测验原理与经验。每章末均附讨论题和中文参考书报篇目,全书末附英文参考书报索引。所举测验材料,大多适用于中国儿童,被誉为“测验最简便的普通用书”。收入《中国现代丛书》。此书为廖、陈在中国首次开展心理测验的实验和研究的又一本力作。对中国现当代的中等教育理论及心理学研究具有很大影响,此书多次再版。

《家庭教育》 中国近现代教育家陈鹤琴著。